

“浙江天省”史实考

邹晓芑 邹身城

提要：1. 两广的江浙移民—“客家人”是拜上帝会发动金田起义之母。2. 太平军奇袭杭州，回救天京，彻底瓦解清江南大营，并进而创建“浙江天省”，此为太平天国军事史上辉煌的一页。3. 去年萧山发现的所谓“东王杨秀清衣冠冢”，实为天国后期四大支柱之一的辅王杨辅清的衣冠冢。

关键词：太平天国 祖籍 宗谱 遗迹

作者邹晓芑，男 1957 年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导师；邹身城，男，1928 年生，浙江大学教授（兼）、杭州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理事。（杭州 310028）

太平天国运动曾在中华大地上谱写悲壮的乐曲，它在杭州曾建“浙江天省”治所，著录绚丽多彩的篇章。值兹纪念天国创建一百五十周年之际，考订有关史实，供这方面研究工作者和史学爱好者参考。

一、“客家文化”源于江浙

太平天国起义的早期骨干多为两广“客家人”。所谓“客家”，指由外省迁来南方垦殖的移民。他们的生活习俗、语言发音乃至社会地位均与两广当地土著有明显差别，所以被称为“客家”或“来人”。据专门研究两广客家的学者罗香林在所著《客家源流导论》中指出：客家并非少数民族，他们是北方汉族南迁的一支。他们原来在晋代定居长江两岸，有的人籍浙江，宋末元初才开始进入岭南，到明末清初遍及两广、台湾。在迁移的历史过程中，经历千辛万苦，难免遭受各种压迫，与当地土著时有摩擦，锻炼成吃苦耐劳团结奋斗的精神，平时生活热情好客，喜欢结盟拜会，便于互济共存，从而形成一种富有特色的“客家文化”。他们一旦遭遇社会动荡，两广客土结盟反抗的事例史不绝书。这是太平天国运动起于两广的社会原因之一。

综观天国首义诸王，计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均为“客家人”。后期五大支柱：干王、英王、忠王、辅王、侍王，也都是客家人。他们的祖先大多是从江浙一带南迁的移民，其中领袖洪秀全之祖先，可考定早年曾世居今杭州地区的淳安、建德一带。

我们在研究洪氏世系时，发现洪氏有多种宗谱，其中一部名《万派朝宗》最为完整而珍贵，却被日本人盗走了。抗日战争时，有日本军官矢野兴诡称自己是“天王子孙”，带兵来找洪姓族长，软硬兼施，掠取了《万派朝宗》及画像等文物。近年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们结识了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小岛晋治，与他谈及此事，托他探寻《万派朝宗》。当再次会见他时，他带回这一宗谱珍本的复印本，并证实当年确是日本侵华的南方军司令部组织人员冒充洪秀全后裔而拿走这批文物。我们后来参考了广州博物馆藏的《万代书香部》和《万代宗枝》，对这本《万派朝宗》进行校勘，编订成一本《洪氏宗谱校遗本》，交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于是千余年来的洪氏世系一目了然。

洪氏于晋安帝时入籍新安郡遂安县（今淳安），后有一分支定居严州（今建德）。南宋名臣洪皓移居乐平，其曾孙洪璞任福建泉州府晋江县县尉，举家移住福建。元末社会动荡，唯岭南较安定，洪璞的第十世孙洪贵生从福建迁往潮州府海阳县的布心垦荒，所以洪贵生是洪氏迁入广东的始祖。洪秀全便是广东洪氏的第十六世孙，也即移居花县官禄梯的第六代。如今浙江淳安、建德、临安、余姚、宁海一带，仍多洪姓，追根溯源，多数与洪秀全同属一本，真所谓一千年前共一家，他们之间的血缘和文化均有所联系。重视宗谱和族谊，寻根追远，正是客家文化特征之一。

事实上在生活安定生产发展的情况下，人口的繁衍速度是惊人的。试看《洪氏宗谱》记载：洪秀全前五代的高祖洪谏三只身从嘉应州石坑迁居花县官禄垦荒，见土地肥美，就把四个儿子叫来，那是康熙四十年（1701）。这五口之家，到道光末年（1850），已繁衍到 500 多人。可知短短一个半世纪，人口增长达一百倍。（宗谱）记载他们初到花县时，这是个新建小县，环山数百里，“荆榛弥望”，荒无人烟，而至道光末年的金田起义前夕，花县垦户稠密，发生“人满之患”。洪氏南迁的过程，实是两广几百万客家人转辗流徙的一个缩影。两广本是人口稀少的“宽乡”，需要补充人力去开发垦殖，这种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性，正是造成江浙闽人口陆续南移的客观条件。然而人口的大幅度增殖，使早先的“宽乡”也逐渐变成了“狭乡”。所谓“户口繁衍，田亩未广，佃众田稀，抢耕日甚”，加上大地主兼并土地，社会矛盾必然激化。这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加以鸦片战争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遭受破坏，两广首当其冲。禁烟备战时期广招民团，战后整批解散，大多流为“盗贼”，挺而走险。眼看朝廷无能、官僚腐败、民怨沸腾，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他们正是利用时机，借上帝会名义点燃起造反火把，发轫于广西的穷乡僻壤，迅速延及大江南北。他们向往金陵王气，苏杭天堂，因而转战万里，选定苏州浙皖一带为基业，作为天国的“小天堂”。

客家人大多知道祖先来自江浙，因而彼此见面认为乡亲。洪秀全、冯云山进行秘密活动时，往往利用“客家”的老乡关系得以落脚。1845 年他们首先到贵县时寄居于客家人黄盛爵家，传教的赐谷、长排、万杨等处也是客家聚居的村落。到紫荆山创业时，初到古林社借宿路店张家，也是客家人。到高坑冲仍落脚于路店张家的族人家中。在大冲教书的东家曾开文、在黄泥冲寄居的曾玉珍等都是客家人。正因为同讲客家话，才能为客家子弟授业，同时方便传教。后来到紫荆山结识客家山民的领袖杨秀清，唤起炭工山民同来拜上帝求福音，有全家全族领受洗礼者。在贵县，赖客家人石达开支持，在石达开家乡奇石好附近很快发展教徒数千人。至于起义的大本营金田，就设在客家人韦昌辉的家里，得韦氏七兄弟的大力支持。可见从花县立教、紫荆创会到金田起义，洪秀全、冯云山都是在客家聚居的地区中进行活动，并得到客家人的大力支持。所以，不仅拜上帝会的创始人洪秀全、冯云山他们是客家人，而且据《太平天国起义记》（据干王洪仁开口述写成）等文献记载，“拜上帝会教徒多为客家人”。正如太平天国史学术权威罗尔纲所指出，洪秀全利用了客家人的关系，利用了这一民间血斗的时机，深入到这些由客家人组织成的集团里去宣传他的宗教思想、造反理论，后来客家人械斗战败无家可归后，纷纷归附洪秀全共同走上起义的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客家”是拜上帝会发动“金田起义之母”，川更长远地考察，江浙移民后裔对这次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具有源远流长的影响。从客家人的本源及其文化特征来看，太平天国之定都天京、创建“苏福省”和“浙江天省”并非偶然的事了。

二、“浙江天省”创建前后

杭州地区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根据地。正如范文澜所评价的：“太平军后期内部分歧，力量分散，大局无法挽救，但天国还能延长三年，这全靠李秀成为首的一支军队对革命无限忠诚，和江浙人民对革命的有力支持。”杭州作为天国“浙江天省”的中心和战略要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天国前期限于实力，其势力范围东部限于镇江为止，未及东顾苏杭。第一次进军杭州是 1860 年 3 月 19 日。当时清朝统治者派钦差大臣和春统率江南江北诸军，对天京步步进逼。太平军先后撤出漂水、句容、镇江、江浦，南北通道阻隔，粮食供应困难。清军乘机在天京西面、南面和东面，修筑起高大的堡垒，挖掘既宽又长的壕沟；在北面攻破浦口沿江营垒，占领了九袱州，封锁江面，使天京形势危急。洪秀全与洪仁开、李秀成、陈玉成商讨解围之策。洪仁开分析当时形势说：“此时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攻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分兵远去，即行返旆自救，必获捷报。”他判定江南大营一闻湖、杭告急，必分兵回救，是有根据的：一是当时江南大营的军炮均仰给于杭、苏、湖一带；二是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兼办浙江军务，负有防守杭州的责任。果然不出洪仁开所料，当侍王李世贤率部佯攻湖州时，主力忠王李秀成部从广德入浙，经莫干山山道，由武康直插良渚，奇袭杭州城，击毙清大员巡抚罗遵殿以下高级官员 10 余人。太平军的这次袭击杭州、湖州的军事行动，引起和春极大恐慌，赶忙分兵两路回救，使天京围城外兵势大减。李秀成发现清军江南大营援兵来杭，知敌已中计，立即星夜驰回苏皖交通要道的建平，会合各路人马 10 余万人，对江南大营发动全面的反攻，扫荡围城长壕，连破清军营垒 50 余座，歼敌总兵黄靖以下官兵数万人。清钦差大臣和春败退丹阳，后服毒自杀。至此，为患多年的江南大营彻底解体。太平军缴获清营

中存粮、存银、枪炮、火药、铅子等不计其数，大获全胜。在这一战役中太平军将士初次接触到“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富庶，因而对杭州倍感亲切。这次太平军在杭州城内只停留6天，但给杭州人民留下深刻印象。其来如惊雷，其去如狡兔，真是天兵！

第二次进兵杭州，旨在掩护主力占有苏、嘉，建立“苏福省”，并进逼上海。当嘉兴城下争夺十分激烈之时，英王陈玉成和辅王杨辅清部自宜兴进入浙江长兴、安吉、于潜，进占临安、余杭，前锋曾至杭州城外的卖鱼桥，旋即退去。这是1860年8月5日的事。杭州清军刚庆贺一场虚惊过去不久，同年10月20日，侍王李世贤部自安徽进入淳安，进占严州府城，斩清副将封九贵。11月11日占寿昌、桐庐。16日取新城。20日下临安，斩清副将刘芳贵。21日克富阳，斩清总兵刘季三、都司张顺等。同日李世贤部进占余杭。接着分富阳、余杭两路进逼杭州。由于这时杭城已由新任巡抚王有龄接防，防守严密，不易在短期内轻易攻取，于是撤兵北去。这次虽未进入杭城，而顺利扫荡杭城附近州县7座，连斩清将多员，从而掩护了忠王李秀成在苏嘉战场取得胜利，为建立“苏福省”奠定基础。

第三次取杭州是全面开辟浙江根据地，建为“浙江天省”。前两次进军是这次的前奏。这回轻车熟路，加以忠王李秀成在浙赣交界的铅山河口会合来投奔的翼王旧部朱衣点、童容海、吉庆元、汪海洋等统率的20余万人马，军容大振。大军经汤溪、兰溪到达严州（今建德梅城），在此忠王主持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会后分兵五路开拓浙江各州县；侍王李世贤以金华为重镇，一面防备衢州之敌，一面进兵台州、温州各州县；李世贤部将黄呈忠、范汝增进军宁波；李秀成部将陆顺德进军绍兴；李秀成另一部将谭绍光进军湖州；忠王李秀成自统大军主攻杭州。

1861年10月中旬，忠王李秀成主力部队从严州出发，经桐庐、临安、余杭，所向披靡。28日，占领卖鱼桥。11月3日，抵达岳坟，即从孤山一带，穿苏堤向南屏围攻杭城侧面。清方西湖水军截断苏堤上的玉带桥，并以炮船前后夹击。太平军退至九里松。5日，改由朱桥猛攻馒头山。王有龄事先派杨金榜率清军在馒头山上驻守，连筑三营，与望江、候潮、凤山各门外守军连成一气，阻止太平军接近城墙。太平军气势勇猛，一举攻下馒头山；继而连克清军驻扎在城外的营垒，斩清副将杨金榜、王振声。至此，太平军已把杭州城团团围住。清方官员许瑶光哀叹：“浙江局势，无节不断，无根不掘，无叶不剪矣！”实际上杭州已成一座孤城。

清浙江巡抚王有龄虽在激战以前多次从上海洋人手里购得大批军火，仅其中一次清单就载有“洋炮40尊，重一万斤；洋枪256杆”，奈守军士气低落，在“外绝援兵内绝粮”的困境中，无人敢于出战，粮道始终打不通。杭州籍豪绅胡雪岩设法从宁波运米两万石，企图接济守城清军，但粮船驶抵三郎庙，苦于江路被阻，粒米不能进城，反而为太平军截获。这时，李秀成发动攻心战，不断射入箭书，劝告满汉军民“不究既往，降者免死。”于是清军下层士兵不肯再为统治者效命了，纷纷在黑夜缝城逃出，有的结队出降。人心涣散。12月29日黎明，太平军分别由主将陈炳文、邓光明、童容海、刘鼓鸿等率领，从望江、候潮、凤山、清波四门攻入杭州外城。王有龄以下官员数十人毙命；布政使林福祥等数十员被俘。两天后攻入满城，杭州将军瑞昌、副都统杰纯、关福自杀。李秀成采取优待俘虏政策，对所有俘虏无论官兵一概发给川资放走，以利分化敌人。对百姓给予保护，严禁杀掠，从嘉兴运米万石、钱二十万千，安抚难民。对死于战火的无主尸体，帮助埋葬。笼罩于战争阴霾下的杭城，重新露出了太平的曙光。不久创立“浙江天省”，由朝将邓光明（后封归王）担任“总理全省民政”。

三、政声和遗迹

太平军领有杭州建立浙江天省，前后仅两年零三个月，于1864年3月30日在清军左宗棠部和德克碑“洋枪队”联合进攻下撤离。

这期间尽管兵荒马乱，在邓光明的掌管下，杭人生活还过得去。表现在天省给贫苦市民发放贷款，不收利息，只求半年还本。维护正常贸易，当时清河坊、孩儿巷、武林门外十里长街，都是买卖兴旺的地方。郊区也设有买卖街。太平军常把商品运到郊区的买卖街去出售，再从农民手里买回所需的物资。规定开业经商要领取“店凭”或营业“执照”，缴纳一定税金。现发

现有当年发给钱塘县珊墩（即今杭州三墩）恒兴腌腊店的太平天国店凭，上载明：“务须公平交易，毋得昂价居奇，致干查究。”除了保护民间工商业外，浙江天省设有公营商行，如有官丝行、丝绸庄、山货行等。原杭州郡痒辟为硝馆，兼铸钱币，币上文字为“太平天国圣宝”，以利市场流通。立海关，关税自主，不许外商享有特权。外商从上海运来货物，经过清军把守的得胜关时，只须亮出外国旗号就不必报税；而太平军的关卡就不卖帐了，一律按章纳税，税后发给卡票，但严禁贩运鸦片。农业的管理，设总制、监军官职，从本地人中遴选充任，总司粮政，以保证粮食供应。规定田赋每亩收粮一斗，征额低于往年，颁发“护凭”责令农民交租，由地主交纳田赋。为保障农业生产，杭州太平军佐将曾责成监军到仓库领取稻谷发放给缺乏种籽的农民。又曾联合苏福省共同修治钱塘江北岸的海塘，免遭海潮侵袭。时逢杭州附近连续两年丰收，人民生活基本安定。

时过一个半世纪，人亡政衰，一切都成过眼烟云。留下的遗迹遗物不多，仅浙江博物馆中保存零星的一些遗物和文献。原有的归王府（柴垛桥堍）、听王府（小营巷内）遗址，均在市政建设中湮没了。

去年在萧山冒出一个“东王衣冠冢”，说是有东王子孙流落于杭州修筑的。但据研究考核，“东王直系子孙”之说，恐为辅王杨辅清后裔之误。因东王族弟杨辅清为天国后期四大支柱之一，他在东王全家被杀之后，仍高举“东殿”旗帜，为天国尽忠。天京失陷之后，他奉幼天王驻跨湖州。湖州失陷时，他突围过杭州郊县，全军崩溃于临安白牛桥，家眷逃散，有幼儿流落杭州。辅王杨辅清只身剃发易服潜行至上海，又搭船转赴澳门。一度在澳门落脚，重新成家，在那里也留有后裔。事隔十年后，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清政府在东南沿海募兵设防，杨辅清乘机潜入福建晋江，拟投入军营伺机策划起义。不幸被叛徒马融和识破而遭逮捕，由当时的闽浙总督李鹤年下令，于1874年7月在福州被杀害。他是一位为太平天国奋斗到底的英雄人物，值得后人怀念。如果说萧山有他的衣冠冢，倒是比“东王衣冠冢”之说可靠闭。

【注释】

[1][2][7]邹身城、邢凤麟著：《天国史事释论》，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85-87页。

[3]邹身城：《洪氏世系与人口迁移》，《文汇报》1981.11.9.2版“学术”专栏。

[4]邹身城：（洪秀全族谱归宗记），《光明日报》1981.7.6.4版“史学”专栏。

[5]邹身城：《洪秀全祖籍在江浙》，《浙江日报》1981.8.15.4版“文化”专栏。

[6]陈周棠等编：（洪氏宗谱校遗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8]王兴福：《太平天国与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55页。

[9]陈宝辉等著：（太平天国诸王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224-230页。

责任编辑：徐吉军